

李白考

何树瀛 著

谜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生于西域碎叶城。其父李客，为隋末大儒李春园之后裔。李白自幼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有“谪仙人”之称。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自然，对后世影响深远。李白一生经历坎坷，曾入翰林院供奉翰林，后因权贵排挤而辞官。晚年漂泊江湖，最终在当涂病逝。其墓地在安徽当涂，现建有李白墓园。

一个文化大家的身世之谜，一个名震清史的诗人之谜：他究竟是汉人还是胡人？

重刻以纪念他的逝世一十



中州古籍出版社

K825.6/280

2007

李白考 谜

何树瀛/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白考谜/何树瀛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7
ISBN 978 - 7 - 5348 - 2789 - 1

I. 李… II. 何… III. 李白(701 ~ 763)—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1434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彩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7.875

字数: 840 千字 **印数:** 1—3500 册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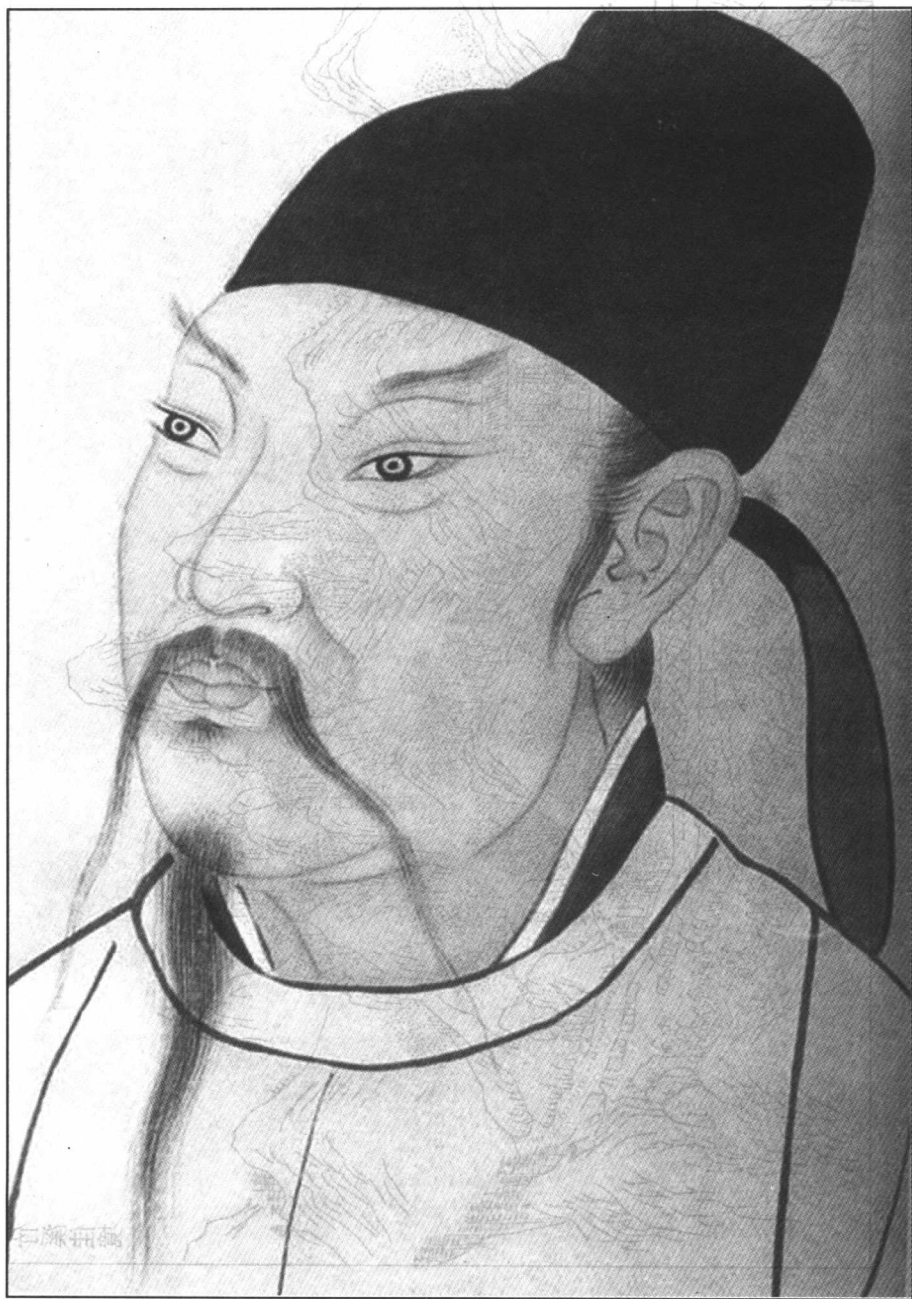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賀松廬同志大作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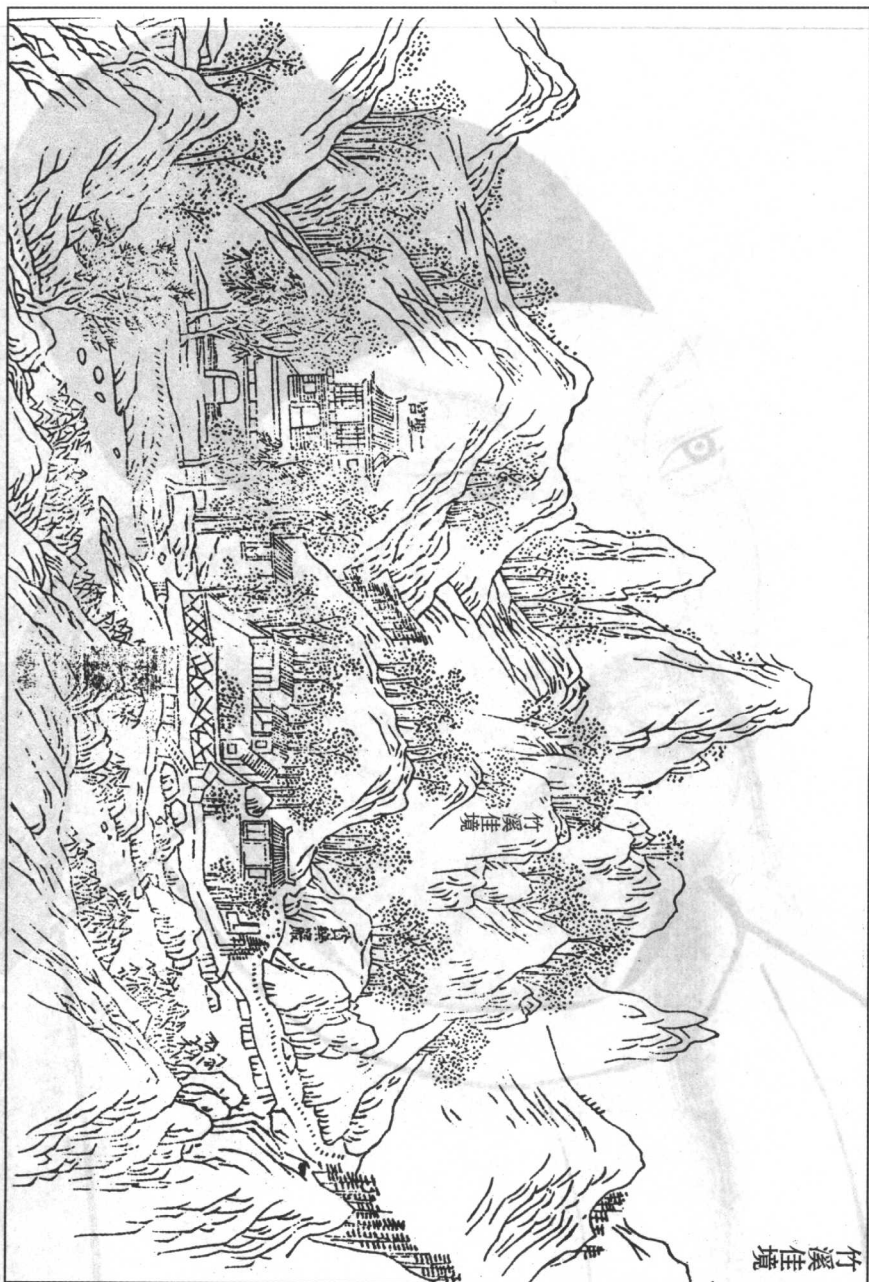
探索詩仙奧秘
弘揚民族文化

壬午年冬月張岐





李白像



《泰山图志》之徕山“竹溪佳境”

序 诗

神州千载颂诗仙，
笔舞龙蛇惊地天。
醉咏狂歌抒壮志，
热讽冷嘲斥佞奸。
浪迹四海多疑点，
墨洒五湖少定观。
相恋情倾驱迷雾，
书成就教众高贤。

咏李白

何树瀛

宗室余脉，王侯嫡孙。
父祖蒙冤，星降寒尘。
心怀日月，气吞江河。
功追鲁连，志凌谢葛。
七说长安，四闯虎穴。
叱咤疆场，笑傲朝阁。
指点江山，挥斥鸡鹅。
梦系荣亲，情倾报国。
抱壁难投，放浪林壑。
诗惊鬼神，文震龙蛇。
醉饮求真，仙游问佛。
我行我素，任尔评说。
泰山不倒，大海扬波。
千古奇人，万世楷模。

序

树瀛同志大作《李白考谜》行将出版,作为同乡友人,我感到十分欣慰,草撰此序,以致贺意。此书涉及自晋至唐360余年历史变迁与时事,李白63年曲折传奇之经历,及其现存1100余篇诗文的写作时地与用事等,内容浩瀚,笔势纵横,洋洋70余万言,其中多数观点与材料,为作者新考新见,熠熠生辉,灿若群星,令人目不暇接。要在短期内和一篇短序中作出全面客观之评价,实在勉为其难。此谨将几点初读之感受,略述如下,姑作抛砖引玉,以待识者。

一、我读此书,首先为树瀛同志作为史志工作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所感动。李白研究,一向被学界列为“老大难”。由于历史上留下来的可靠记载甚少,且存有若干扑朔迷离、互相抵牾之处,致李白家世、家难、祖籍、生地和毕生理想追求、思想情怀、人生经历、死因死时等,成为千古之谜,给治学者带来种种困难与困惑,并因之导致了学界的诸多误解与误断。上世纪80年代初,树瀛同志察觉到此情况后,深深为之惋惜,决心倾其余力,为还归诗仙李白的历史真实、生活真实,进一步发掘弘扬其宝贵遗产做出自己的贡献。20余年来,他在从事繁重地方志工作的同时,克服身居小县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压力,想方设法搜集阅览各种有关图书资料,并为之牺牲了全部星期日、节假日与无数睡眠时间,每天工作常达15小时以上。其间,他因过度劳累而先后身患多种重病并多次被迫住院治疗,给家庭经济与生活造成困难,甚至一度靠服用止疼药坚持工作,双目因熬夜过多而几近失明。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其既定目标与意志,并终于较好完成了此项艰巨繁难的研究课题。我以为,在许多人醉心于金钱、权欲、物质享受和盲目崇拜外来文化的世风下,树瀛同志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及其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而无私奉献的治学治史精神,尤其值得尊重、肯定与发扬。

二、树瀛同志此书对李白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其中最突出、最值得重视的是:

(一)揭开了李白家世、家难、祖籍变迁与生地等千古谜案,为研究李白思想性格、理想追求、生平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依据。李白家世、家难、祖籍、生地问题,一向为学界探讨关注的热点之一。但由于对李白有关自述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以下简称《李序》、《范碑》)等有关记载中的曲笔伪托之词未作历史考辨与透视,导致了种种猜测与臆断,并均将李白家难误断于隋末。其中影响最大的,为已被学界普

遍采用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主李白为“地主兼商人世家说”和“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说”。树瀛同志在《李白家世·祖籍·生地考辨》等文和《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生平诗年谱》中,运用较多可靠史据与精辟剖析,彻底否定了郭老等人之臆说,确切考证李白为公元420年因遭沮渠蒙逊难而移家金陵(南京)的凉武昭王李暠嫡孙李重耳的七世孙,唐高祖李渊的四世族祖系族孙。隋末动乱,李白曾祖父为避窜于江东的炀帝残余势力迫害而“奔流咸秦”,投身李渊义军,不久被纳入唐宗室属籍,封为郡王,并“因官寓家”长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一月,同其他宗室远房郡王一起,被降为郡公(一说县公。相当于古之侯爵)。李白《九日登山》诗所谓“自作英王胄,斯乐不可窥”,《送杨燕之东鲁》诗所谓“我固侯门士,谬登圣主宴”,即是指其曾祖父与祖父先后位居郡王、郡公事。而被学界认定为核心资料的《李序》所载李白先人“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碑》所曲载的“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均确指因李白祖父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四月组织“宗室十二人”扶李倒武、谋迎中宗失败被抄斩,年幼的李白父亲与家人被株连流放犍州(今四川西昌一带),后于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春武氏集团诛杀各地流人时,“易姓与名”,潜逃于中亚碎叶。不久形势好转,逐渐“内移”,定居于其远祖李暠故乡陇西成纪(在今甘肃秦安西北),并很可能靠陇西李氏父老资助和于“丝绸之路”行商而致富。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李白生于成纪。《李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等,可为确证。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唐中宗复位,连连下诏昭雪武则天制造的冤杀冤流案,李白父亲赴京申诉求嗣爵,因无谱牒为证,被判“假冒罪”再次流放,并因之被唐宗正寺宣判为“绝嗣之家”。李白与家人因怕再遭株连,遂由成纪潜逃,隐居于蜀中绵州昌明县(今四川江油市)。《李序》所载李白一家于“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碑》所载“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遁(逃)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皆指李白与家人于神龙元年春夏间闻知被判假冒罪后,先后潜逃蜀中绵州事。《范碑》所谓“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国朝以来,漏于属籍”,也曲指李白一家因永昌元年被抄斩流放时失去宗室谱牒,于神龙元年中宗恢复唐朝后被宣判为“绝嗣之家”,永远被降为罪人、庶人事。李白、李阳冰、范传正等之所以对其家世、家难记述半露半掩,杂以曲笔伪托之词,根本原因也在于此。树瀛同志的上述考断,理据充分,逻辑严密,读来有如拨云见日,堪称是对李白研究的一大贡献。

(二)由于过去未揭开其家世、家难之谜和身世、生平之谜,以往对李白复杂、独特思想性格及其理想追求的研究,也存在种种误解、曲解与片面性。例如,为什么李白既有许多抒发爱国爱民情怀,表达强烈渴望早日建功入仕、“事君荣亲”之作,又有较多歌颂侠士、纵横家、隐逸者之作和较多任侠诗、游仙诗、参禅诗、隐逸诗?李白的理想追求与思想核心是什么?这些都是长期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本书《年谱》结合有关诗文内容的考述,明确强调指出:李白毕生之理想追求,即为渴望尽快建功入仕,如大鹏展翅,“一飞冲天”,成为皇帝身边的辅弼大臣,在帮助皇上大治天下和取得皇上的绝对信任后,陈明父祖冤案,匡复宗室豪门和王侯世家荣耀,然后“功成身退”,去过“浮五湖,戏沧洲”的隐游生活。李白在少年所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所述渴望践行的“事君之道”与“荣亲之义”,在晚年所作《赠张相镐》诗中所深切表达的“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均指其此两大政治追求与理想。李白一生百折不挠,“不事产业”,强烈追求功名仕途,功成身退,根本原因也在于斯。作者通过《代寿山

答孟少府移文书》等诗文考析,进一步明确指出:李白的思想核心,即为儒家一贯倡导而被李白赋予了某些新的内涵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侠士、名士、纵横家之术,道家、佛家、隐逸家之术,只是被李白用为谋取仕途、治国齐家和修身养性、排遣怀才不遇幽愤的辅助手段而已。与“非礼勿视”等儒家修身观念不同的是,李白更多接受了古今侠士的义勇豪迈之气,道家的崇尚自然与魏晋名士蔑视权贵、恃才放达、不拘小节思想作风影响,因而在其思维、情感、行为方式和诗文创作上,表现出令历代文人赞赏不已的鲜明突出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点。李白的特殊思想、性格和气质,也是由其“蝉联主组,世为显著”(《李序》)的先人基因遗传,特殊的家世祖籍变迁,和由此酿造的特殊的家庭历史文化教育,以及盛唐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与时代潮流的交互作用所铸成,集中体现了盛唐时代迅速壮大的士民阶层和新兴市民阶级的民主政治要求与蓬勃进取精神。由于李白一家和唐宗室在武则天篡位易国时期曾深受“丧权失国”之害,故以深切关怀大唐安危和政治利弊为中心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便构成了贯穿于其众多诗文之中的李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年谱》中,作者通过其大量诗歌的发掘与考析,明确提出并深入论证了李白不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忧患意识最强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位胆识超凡、目光敏锐的政治活动家与政治批评家。作者上述独具见解的精深考述,对于正确认识李白及其作品,也具有非常重要之意义。

(三)树瀛同志此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通过较多史实和李白诗作的考证,纠正了前人对于李白42岁应诏入京前整个中前期行踪与活动的曲解与误断,并对李白后期的某些误断、误解,作了重要考订与补充。如,作者考证李白与学友元丹丘隐居大匡山同师纵横家赵蕤习学书剑和道家修身术的时间,为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二月至开元五年二月,即15至17岁之时,非为旧说20至25岁以前;李白初出巴蜀时间,为开元五年三月,闻知玄宗下诏寻求受害勋臣子孙之时,而非为旧说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5岁时;李白出蜀东征之目的,是去“本家金陵”寻根求谱,赴京应诏,失败后即先后赴东西两都任使游说达四年之久,并曾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至十月从军远征叛胡,“叱咤经百战”(《白马篇》),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谋取功名仕途,而非旧说李白出蜀后尽在游山玩水;李白开元九年十一月由长安返蜀不久,即于翌年秋二次出蜀,仗剑远游,并在北游幽燕、太原谋取军功“失路”后的开元十二年秋“学剑来山东”,访道、漫游泰山、徂徕山、曲阜、兖州、崂山、沂蒙山等,继于开元十三年秋冬至十四年春夏间观览玄宗封泰山仪仗及有关刻石后,由泰山、徂徕山南游吴越,而非旧说李白只有所谓开元十三年一次出蜀和出蜀后即顺江东游吴越;李白与安陆许氏妻结婚和移家安陆,为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春节前后,而非旧说开元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是因于安陆受诬被逐,时间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初秋而非旧说开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李白东鲁寓家地点为徂徕山西南隅“鲁门东”,而非旧说任城或新说兖州城;李白曾于开元六年十月至开元九年三月、开元九年十至十一月、开元十九年三月至开元二十年三月、开元二十一年二月至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开元二十七年二月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天宝元年九月至天宝三年三月、天宝十二年正月至同年八月,先后七次出入长安谋仕,而非旧说只有天宝元年秋一次应诏入长安。另外,作者考证李白开元十年秋二次出蜀后,其父母亲人即由蜀中绵州昌明县返家陇西成纪故居,李白曾于三入、五入、六入、七入长安期间五次赴成纪探家。此一重大发现,揭开了李白何以数十年不回蜀中探家之谜,纠正了所谓李白儒家忠孝观

念淡薄、缺乏家庭责任心等误说,进一步发掘展现了李白所固有的人性美。

关于李白后期行踪与活动,作者在《年谱》中重点作了如下考订与补充。①李白初出翰林院时间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暮秋,他待诏翰林实际只有一年,而非旧说三年。②李白天宝三年春夏间出长安时,曾应故友岑勋、元丹丘之邀东游颍阳、洛阳、梁园等,后偕其二人和先后相遇的杜甫、高适同返鲁门东故园,与其四人及孔巢父等“竹溪六逸”友人在徂徕山、东蒙山一带隐游年余之久,并曾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中秋一同于徂徕山炼药院采药炼丹。③李白与元丹丘于炼丹失败后的同年秋冬至翌年二月,曾东游蓬莱、辽海和辽东半岛求仙,失败后,于天宝五年暮春南游吴越。④李白于开元五年初秋和天宝六年秋至翌年仲秋、天宝十三年秋至十四年早春,均曾有洞庭湖与潇湘、苍梧之游,而非旧说只有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流放遇赦后一次南游苍梧。⑤李白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后,曾北上、西行,投军献策抗敌,失败后方偕宗氏妻南奔,而非旧说闻安史之乱起“仓惶南逃”。⑥李白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因入永王璘幕府被囚被流是一场历史大冤案,而非旧说“误入歧途”、“罪有应得”。⑦李白流放遇赦之地为四川南浦(今万县市),而非旧说巫山或夜郎。⑧李白暮年由金陵去宣州(在今安徽)当涂县投奔从叔李阳冰时间为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十月下旬,而非旧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初。⑨李白是宝应二年八月于当涂西北采石矶含恨投江而死,享年63岁,而非旧说宝应元年十一月62岁病死当涂。⑩李白墓由采石江边移至龙山东麓时间为宝应二年十月,移葬原因是得益于“左拾遗”封赏(此问题前无定考)。

作者对李白行踪、活动与曲折传奇经历的详细考证,使其一生及其诗文中的众多谜案得到了破解。

(四)本书《年谱》以探索李白思想情怀、行踪活动为主线,对包括许多被前人列为“不可考”、“不编年诗”和“伪作”在内的现存李白全部诗文的写作时地、用事、立意等,逐一作了考订编列,并对李白诗歌的风格多样性特点和艺术手法,作了扼要点评,从而为学习、研究李白及其诗文,提供了更多方便与启示。

三、《李白考谜》一书所以能够取得较多新的研究成果,是由于作者认真汲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较好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系统论方法,坚持从有关历史背景、世事变迁与李白思想性格发展及其全部诗文的内在联系上去考察每一个具体问题,因而较好地克服了就事论事、就诗论诗、断章取义、主观臆测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因此,全书对李白的考证与结论,就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创造性、真实性、可信性。另外,此书对李白任侠京洛、从军远征的考述,对于王维、王昌龄等盛唐诗人与任侠诗、边塞诗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我认为树瀛同志此书创造性地填补了李白研究空白,纠正了其研究疏误,比较深刻全面地揭示了诗仙李白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堪称是李白研究史上的一座新的丰碑。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必将会促进李白研究事业获得新的发展。

赵培熙

2005年11月5日

前言

李白是举世公认的千古奇人。他不仅是一位最具个性、最具创造力、天赋超凡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位政治理想异常坚定、异常强烈、胆识超凡的杰出政治活动家与批评家。他的流传至今的上千篇诗文,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关他的可信记载很少,且存有若干扑朔迷离、相互抵牾之处,致其家世、祖籍、生地、家室、山东寓家时地、毕生思想行踪与活动及其众多诗文的写作背景与时地、用事与寓意等,成为千古不解之谜。

宋代之后,尤其是明清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上述谜案之探讨,并在诗文校笺系年、思想行踪探索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他们的探索精神与贡献,为后人学习研究李白树立了榜样,奠定了基础,是值得永远尊敬和发扬的。

然而,也勿庸讳言,由于未对有关历史背景与时事和李白全部诗文作细致考察,在上述诸方面研究上,尚存有诸多疏误,尤其是相继因袭了清人王琦对李白自述家世祖籍变迁和中前期行踪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之用语、作时的误解与误断,不仅导致了对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生地、李白寓家安陆时间、李白移家东鲁时地与原因等重大问题的误断与误解,而且导致了对李白出蜀时次动机与路线、李白游说两都时次与活动、李白北游时次与路线、李白“学剑来山东”时间与活动、李白初游吴越时间与路线等诸多重要问题的误解与误断。另外,对李白出蜀前已有结发之妻问题、开元五年初出巴蜀赴“本家金陵”寻根求谱问题和失败后任侠游说两都问题、开元九年四至十月曾从军远征讨伐叛胡问题、李白父母等于李白二次出蜀后返归陇西成纪故居和李白曾五次赴成纪探家问题、李白与许氏的爱情生活与婚后不幸遭遇问题、李白天宝四年秋于徂徕山炼丹和失败后东游蓬莱辽东求仙问题、李白于天宝六年和天宝十三年西游洞庭苍梧问题、李白于安史之乱初起时曾北上西行投军献策问题、李白偕宗氏妻南奔路线问题等,迄今未见有人考及;关于李白待诏翰林时间、出京路线及归故园后的活动、李白长流夜郎起止时间与遇赦放归之地、李白晚年卧病当涂青山时间与活动及其死因与死时、李白墓由采石江边移往龙山东麓原因背景与时间、李白特殊思想性格之形成、李白求仙参禅之本旨、李白政治上屡遭失败及其悲剧结局之原因、李白毕生之评价,以及《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等八赋和《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梁园吟》、《将进酒》、《菩萨蛮》、《忆秦娥》、《古风五十九首》等等许多重要诗文之写作时地与立意,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迄今亦未获得共识。另有部分诗歌,自昔被定为“不可解”或被误断为“非李白作”。

这许许多多重大历史谜案不解决,显然会严重影响对其宝贵精神遗产的理解与弘扬。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不惜生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负病披阅考索20余载,呕心撰写了奉献给读者朋友的这部小书。旨在汲取众家学说之长,弥补以往疏误,力求与广大读者一起,共同破解上述千古谜案,还归一个更为符合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及其思想性格真实的李白形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主观愿望。要完全达到此目标,尚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本书包括论文和《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生平诗文年谱》两大部分。《年谱》以考索李白家世祖籍变迁、思想情怀、行踪活动为主线,大致以时为序,对现存基本可以确定为李白所作的1106篇诗文(包括残句、题词四则)之写作时地、背景用事、主题大意(有争议或误解、未解者)等逐一作出考辨,并择要收录了前贤、时贤的不同观点,以便读者比较鉴定。论文系自1983年以来陆续写成,均为独立成篇,个别观点与材料不可避免地会有所重复强调与补充。因部分已发表,为保留原貌,此类均不再作大的改动。个别观点与《年谱》不同者,以《年谱》为准。其中《孔子宰中都考评》一文,曾在《孔子宰中都》、《孔子研究》等书刊发表,未收入本人前之文集,为保存史料和供读者研究李白中都诗作参考,也予附录于本书。本书原拟对上述重大问题各写一、二篇专论,后考虑所需文字和占用读者时间过多,只好作罢。好在我的观点均在《年谱》中有所考述,细心阅之,庶几可以由其内在联系上分别找出答案。

下面简要谈谈探索方法问题,这对李白研究和阅读本书非常重要。前些年,曾看到有位学界前辈发表过如下训示:关于李白家世、生地、行踪、死因等,“是永远无法解开的千古之谜”,主张在未得到“新的出土文物确证”以前,要永远“存疑”。言外之意,永远维护由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所草创,后经他们几位老前辈作了某些改良补充的传统观点。由此理念出发,该文对包括已为学界多数同仁认同的某些“越轨”新探索,统统批评为“臆说”与“传奇”。某些期刊也秉承其训,往往以“无确据”为由,拒绝发表有关探索论文。此种说法与做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李白不是唐玄宗,不会有人为他写“起居录”。李白生前即“难求谱牒”,以后也绝不可能再发掘到此类“地下文物”。若依其说,无异于要取消李白研究。我想,这是学界大多数同仁所不能赞同的。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有关问题研究?窃以为,在现存文献记载甚少且存有抵牾的情况下,要揭开李白一生的千古之谜,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系统论的方法,紧密联系有关背景资料与史实,对现存文献记载、前人研究成果和李白全部诗文,进一步作些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探索、考证与梳理,力求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准确把握三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同李白思想性格、文字风格发展的内在联系,并由这种本质联系、内在联系上,去逐个求得上述谜案之破解。舍此艰苦细致的工作而将希望寄托于所谓“出土文物”上,显然是不切实际之梦想。

事实上,以往对若干作家作品之研究,如《钱注杜诗》、陈寅恪《元白诗笺证》、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等,便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的此种方法。细察以往李白思想行踪之研究,凡是比较接近真实可信的部分,如李白去朝后南游吴越的思想行踪与诗文系年,李白流放遇赦前后的思想行踪与诗文系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郁贤皓、李从军、安旗等先生关于李白于开元十九年、天宝十二年入长安的考证等,也都是采用的此种方法(尚嫌粗疏)。而王琦以来对李白家世、生地及其中前期思想行踪与诗文的探讨之所以

会陷入误区,也主要是因为背离了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如,关于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生地考证,论者往往只看到李白自述之辞自相矛盾及其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以下简称《李序》、《范碑》)所载不相吻合的一面,而没有去深入探讨三者之间互相补充、互相关照、互相掩饰的一面,也未去深入考索之所以会造成其自相矛盾、互相矛盾及其隐约其辞,先后取用曲笔伪托笔法的历史原因,并以此置李白自述之辞于度外,单单在《李序》“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范碑》“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两段话上作文章,机械地将李白先人窜逃“碎叶”、“条支”(也实指碎叶)时间断为《范碑》伪托的“隋末”(对其“非罪”作了种种之猜测),并因之将李白出生地断为碎叶或条支,将其家世断为商人或地主兼商人。有些论者甚至据此怀疑李白是否姓李,或即断为西域胡人。凡此种种。此种考辨方法,显然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亚碎叶、唐条支都督府等西域之地,在隋代、唐初属西突厥国,李白先人既逃入其境,何必要“隐易姓名”,直至李白出生后方恢复本姓?早在唐朝建国之初,即下诏为被隋炀帝滥杀者平反昭雪,“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旧唐书·高祖纪》);贞观五年四月,唐王朝不惜“以金帛”购回因隋末动乱逃没于西突厥国的中国士民“八万人”,并“尽还其家属”(《旧唐书·太宗纪》)。其后,太宗、高宗、则天、中宗等均曾数次大赦,李白一家何以至唐朝建国87年后的神龙元年还要“逃归于蜀”,而且不早不迟,恰恰在唐中宗复位,屡屡下诏昭雪武氏集团制造的冤杀冤流案时“逃归于蜀”?李白、《李序》、《范碑》等何以对其家世、家难等隐约其辞、杂以伪托?所有此类问题,都是用“隋末说”无法解释的。说李白生于碎叶,与《李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和李白多篇诗文自叙,亦明显不合。

再如,李白自述家世祖籍变迁和中前期行踪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之作时,《王谱》仅据本文“(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即断此书为李白30岁即开元十八年作,并以此推断李白25岁前隐于蜀中,25岁即开元十三年出蜀东游云梦、吴越等。这些推断,不仅明显误解李白语意和没有任何历史依据,而且明显违背李白有关自叙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实际与盛唐时代潮流。李白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他“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是自“五岁诵六甲”时算起的,而非自出生后计算的。我在《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作时考》一文已有考证,此文与李白写于开元二十二年二月下旬的《与韩荆州书》为先后作。由李白、王维、王昌龄等人的有关诗歌可证:盛唐时期,少年学子任侠游说两都之风颇盛,年龄一般都在15~20岁之间。李白自云“十五好剑术,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自幼怀有极强的追求功名事业激情。试想,在当时世风之下,他岂能隐居到开元十三年25岁时方思出蜀?他在《别匡山》诗中即已立下“已将书剑许明时”誓言,则他出蜀后何以不径去任侠游说两都,却要东去吴越游山玩水?若依此说,他又如何能在30岁以前“历抵卿相”?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用王琦误说所无法解释的。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因盲目迷信名人权威,其后各家著述几乎皆从王说,以致使其谬说因袭240余年之久,似成定论。我认为,这是造成李白整个中前期思想、行踪和诗文研究错乱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教训是很值得发人深省的。

又如,以往研究者因为开元十三年出蜀说所局限而疏于考证,皆将李白20余首边塞诗

简单笺释为拟前人边塞诗,并多系之于天宝二年待诏翰林时作。这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明显违背“文艺源于生活”的基本创作规律。试想,李白天宝二年优居金门,且是时无战事,他何以想到要去作边塞诗?如果李白未曾从军赴玉门关、天山和古长城一带参加过讨叛胡卫国战争,他又如何能写得出如此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细微入骨的战场生活和玉门关、天山、长城一带的瀚海大漠气候与风光?这些问题,显然也是用传统旧说无法解释的。

我觉得有必要于此强调指出的是,学界至今仍然有些老夫子,还在固执地恪守传统陈旧的所谓“二重考证法”,即对所考证的作家作品,除了被考证主体自己的说法(“内证”)外,一定要有其他文献的明确记载去印证(“外证”)。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重视所谓“外证”,而不重视被考证者本人的诗文自述即“内证”,甚至将考证者根据被考证者思想、性格、行踪、作品和有关背景资料与时事所作的严密推断,也统统批评为“无确据”、“主观臆断”,真是岂有此理!难道任何问题的研究与结论只有过去的有关文字记载或古之道听途说者说了才算数吗?如果是那样,只需将有关资料翻印出来便是,何必要我们再去考证?严密的科学推断,是人类思维与智能高度发展的本质体现,是由已知领域走向未知领域的先驱和桥梁。这种科学推断方法既然可以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为什么不可以用于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为什么一定要由古人去做结论?为什么古人未言及或未理清的问题,就要永远存疑?事实上,由于历史、阶级的局限性,加之客观存在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等原因,所谓“外证”资料,往往带有溢美、掩饰不实之辞和较大的片面性。而且由于古人惜墨如金,不注重调查研究,他们对许多人物、事物的记载,往往只述其大略,且往往带有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断成份。即以《李序》、《范碑》而言,学界公认为是研究李白的核心资料,实际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二文对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家难的记载,均隐去了主要情节和真像,并都采用了曲笔或伪托之辞。二文对李白思想、行踪、活动与作品的记载,更是九牛之一毛。至于后世之《两唐书》李白传、《唐摭言》及小说、稗史、地方志之类所作的某些记载,则荒谬、无稽之谈更多。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部对李白家世祖籍变迁与毕生行踪活动等有一较详记载的文献资料,估计以后也不可能发现。故研究李白,虽然可以参考这些旧资料尤其是《李序》、《范碑》和魏颢《李翰林集序》等,但绝不可以不加分析鉴别地照抄照搬,更不可以将自己锁在这些外证史料所构造的迷宫中做文章。愚以为,上千年来李白研究进展缓慢,与前辈恪守其陈旧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大有关系。如上所述,研究李白,必须以李白自己的作品为主要资料,并有机地将其作品与其思想性格发展、文字风格演变和有关背景资料与时事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应当是李白研究的唯一正确方法。有的论者认为李白诗歌抒情成份较多,不易考察,此说不无一定道理。但世界上不存在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海无风不起浪。李白有许多诗文述及或暗喻有其家世、祖籍与行踪,另有许多诗歌所述之事、所抒之情明显与时事和个人遭遇相关连,只要本着上述方法追根求源,多下些功夫,是可以逐一揭开其千古谜案的。

本书在研究撰写过程中,曾先后得到葛景春、何念龙、李灵年、薛天伟、汤华泉、王辉斌、刘振东、李永旭等专家教授的来函或当面勉励与指教,汶上县人民政府县长周桂萍等给予了大力支持,出版社的史广江先生在编审出版等方面,为之付出了许多艰苦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贤妻郑爱芳,为使我集中精力投入此项研究,20余年来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